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民间信仰研究

范 荧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近十几年来，出版界愈益为生计所累，纯学术著作因印数较少，出版颇为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高校招生的迅速扩大，整个社会的学术创造力大大增强，学术成果愈见丰厚。有鉴于此，本社决定策划出版《人文社科新著》丛书，意在给学术专著的出版开辟一个新的园地，使广大学者积年研究所得的学术心得能够嘉惠学林，传诸后世。

本社向以传播和译介学术文化为己任，为将优秀的学术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的出版物而努力。出版一流学者的一流学术著作固然是我们不懈的追求，但学术成果的价值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凡能采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新颖、扎实的学术著作我们均竭诚欢迎。列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或许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有大有小，但这些成果都是逐步成长累积的学术大厦的必要组成部分。古人云，“积微成大，涉遐自迩”，我们相信，假以时日，这套丛书中一定会出现若干对学术有重大贡献的不朽名作，这是我们和作者的共同期待。

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林林总总，决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范围比较宽广。在丛书出版的初始阶段，取稿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为主，且暂不作分类，待到有一定的积累和规模后，或可按学科分类构成若干专题。

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我们殷切期待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为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做好这件有意义的事情。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上海民间信仰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1
第一节 原始信仰的起源与流变	1
一、原始巫术	2
二、原始宗教	11
三、原始禁忌	18
第二节 上海民间信仰的源头	22
一、马家浜文化	23
二、崧泽文化	26
三、良渚文化	31
四、马桥文化	45
第三节 上海民间信仰的早期发展	49
一、春秋战国时期	50
二、秦汉至唐代	62
第四节 上海民间信仰的日益兴盛	72
一、宋元时期的民间巫术	72
二、宋元时期的俗神祭祀	74
第二章 上海民间巫术的传承与变异	83
第一节 广泛流传的占卜习俗	83
一、占卜算命	84
二、风水堪舆	98

	三、占候望气	104
第二节	盛行城乡的祈禳巫术	116
	一、禁咒镇厌	116
	二、祈福趋吉	127
	三、驱鬼祛病	138
第三节	民间巫术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	145
	一、民间巫术的特点	145
	二、民间巫术的社会影响	151
第三章	上海俗神信仰的发展与演化	157
第一节	俗神信仰的演进及其特点	157
	一、俗神信仰的流行与演进	158
	二、俗神信仰的若干新特点	184
第二节	源于自然崇拜的民间俗神	191
	一、文昌帝君及其他天象之神	192
	二、施相公和老鼠伯伯	200
	三、东岳大帝和沪地水神	205
第三节	地方守护神和家内俗神	213
	一、城隍神和土地神	213
	二、灶神和紫姑	223
第四节	行业神和财神	229
	一、刘猛将	230
	二、黄道婆	233
	三、天后和晏公	238
	四、鲁班	244
	五、五通五路及其他财神	246
第五节	佛道俗神	256
	一、观音	257
	二、地藏	260
	三、关帝	262
	四、吕祖及其他	265

第六节	鬼神崇拜和先贤祠祀	269
	一、鬼魂信仰和祖先崇拜	270
	二、先贤祠祀	276
第四章	上海民间赛会及其社会功能	283
第一节	民间赛会的类型及其活动形式	283
	一、民间赛会的名目和类型	284
	二、民间赛会的程序和形式	291
第二节	民间赛会的组织管理和经费筹集	306
	一、民间赛会的组织与管理	307
	二、民间赛会的经费筹集	313
第三节	民间赛会的社会功能	317
第五章	上海禁忌习俗的沿袭与流行	330
第一节	行业活动中的禁忌习俗	330
	一、农事禁忌	331
	二、船民禁忌	334
	三、建筑禁忌	336
	四、商家禁忌	341
	五、行业隐语	343
第二节	社会生活中的禁忌习俗	345
	一、日常生活禁忌	345
	二、人生仪礼禁忌	352
	三、社交及性别禁忌	360
	四、动物禁忌	364
第三节	岁时节日中的禁忌习俗	365
主要参考文献	373
后记	382

绪 言

近年来，上海史的研究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地处吴越之间，负海枕江、山环水拱的上海，以其独特的魅力，引发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早自上海开埠以来，众多国内外人士即从不同角度对上海的发展演变作了多方面的介绍和描述，并出版了数部开创性的上海史专著。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相关的论著陆续面世。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除涌现大量专题性的论著外，还出现了多部通论性的著作，如吴贵芳的《古代上海述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刘惠吾主编的《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987年出版）、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陈伯海主编的《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①从宗教信仰的研究领域看，也有阮仁泽、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等著作。然而纵观各类论著，令人颇感遗憾的是，有关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研究仍属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相关的专题论文为数有限，^②而

-
- ① 有关上海史研究的状况，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中有比较详细的回顾与总结，可参见该卷第160至2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② 有关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研究论文，主要散见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学会主编的年度论文集《宗教问题探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季刊《当代宗教研究》中。但二者皆为用于内部交流的出版物，故相关的论述不但数量很少，影响也不大。

各类通论性著作，即便涉及，也多以非常单薄的篇幅简略地带过，且议论所及，主要集中在城隍、关帝、天妃等民间崇祀的“显神”上，诸如上海地区的民间巫术、民间俗信、民间禁忌等，则罕见论及。时至今日，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索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论著，仍付诸阙如。

尽管民间信仰习俗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种种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但却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客观存在，时至今日，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仍常见其子遗，因此，就区域性社会文化的研究而言，这本应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希冀在彼岸世界求得解脱的宗教观念始终不发达，而各类原始信仰习俗却在后世广泛留存，长期延续。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流行过不少本土生成的或域外传入的宗教，但大体而言，中国尤其是汉族地区，从未陷入过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信仰活动，是源于原始信仰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祭祀、禁忌等习俗。从历代王朝列入国家祀典的祭祀对象看，除三皇以来的历代帝王、“圣师”，孔孟以来的儒家先贤，以及“忠臣烈士”外，也几乎全是源于各类原始崇拜的神灵。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但未能成为全民信奉的“国教”，而且本身就渗透着颇多古老的巫术、祭祀成分。外来的佛教之所以能够植根于民间，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佛教的中国化和世俗化，众多佛教神灵如观音、地藏、阎罗等，已逐渐转化为中国的民间“俗神”。尽管民间信仰纷繁而庞杂，但其基本特点却是鲜明的，即自发性、多元性、散在性、实用性和功利性。当人们出于此岸的、世俗的强烈功利目的去崇拜某些神灵时，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与特定时间、空条件下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和追求联系在一起。显然，研究与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皆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习俗，不仅有助于揭

示文化深层的诸多方面，而且也为了解一方的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户。由此可见，在上海史尤其是上海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民间信仰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本书的宗旨意在对上海地区民间信仰习俗的传承和演化，作一尽可能全面的叙述和分析，期以筚路蓝缕之功，收抛砖引玉之效。

本书所谓的“民间信仰习俗”，是相对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成熟形态的世界性宗教以及官方的宗教祭祀仪式而言的，特指在民间社会生活中流行的各类信仰活动。不过，上述两点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例如，伴随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世俗化，不少佛教神灵已逐渐融合乃至取代中国民间神灵的“神性”与功能，转化为民间“俗神”，人们对其顶礼膜拜的目的和方式皆发生了很大变化。道教的宗教思想多来源于原始的巫术观念以及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等，故其神仙谱系中原本就杂有众多民间“俗神”，而道教的宗教活动除斋醮、修炼外，也多为追荐超度、祈福禳灾之类的巫术和神仙方术。尤其是宋元以来，那些混迹市井、串街游乡的僧尼、道士，往往热衷参与民间的信仰活动，其形迹与江湖术士、民间巫师实难区别。为此，佛、道“俗神”以及有僧尼、道士参与的民间祈禳活动，亦属本书的考察范围。中国古代官方的祭祀对象与民间社会大致相同，均渊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只是地方性的民间信仰因生态环境、文化传统、民间习俗等的特殊性而生成并盛行许多地方性的崇拜对象和崇拜方式，故较官方系统更为繁复庞杂。所以，在民间信仰中，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有地方官员主持或参与的祭祀活动，也有被官方视为非法的，时时予以取缔的“淫祠”。除纯粹由官方举行的，民间并不参与的祭祀活动外，凡在民间有广泛信仰基础和频繁崇祀仪式的神灵，无论是否为官方所承认，本书皆将其纳入论述范围。

上述可见，本书论及的内容属于广义的“民间信仰习俗”，如果按照民俗学通常的分类方法，实际上广泛涉及精神民俗门类中民间巫术、民间信仰、民间禁忌等各种类型的信仰活动。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巫术、宗教、禁忌等概念的定义和原理分析存在颇多歧说，在此需略作解释。^①

巫术是一种依靠虚构的“超自然的力量”，企图用一整套神秘活动影响、控制事物或环境，以实现某种愿望的行为。一般认为，巫术是原始信仰的一种形式，其与宗教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对客体加以神化，向神灵敬拜求告，而是力图通过人类自己创造的各类法术仪式来直接影响或控制客体。尽管巫术产生于人类对大自然认识、改造能力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是原始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后，原始巫术作为一种传承文化，往往与宗教相结合，继续在民间流行。所以，后世的巫术活动大都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原始巫术的传承，一方面又以变异的形态，掺杂进许多新的内容，中国传统的民间巫术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从上海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本书将“交感巫术”以及较明显地具有“法术”意味的厌胜、禳解、占验等信仰活动，皆归入“民间巫术”之中。

宗教的产生晚于巫术。人们从事各类巫术活动，目的是想通过某种符咒仪式迫使大自然服从自己的意愿，但经过漫长的岁月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巫术的力量并不能让自己如愿以偿，于是便凭借想像，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超自然、超人间的众多神灵，相信这些神灵主宰着整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对此，他们感到无比的敬

① 有关民间巫术、民间信仰、民间禁忌的起源、传承和演变，将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中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不过本书意从历史学而非宗教学的角度对民间信仰进行论述，故无意在定义和概念上作过多纯理论的阐述。

畏和崇拜，企图通过各种献媚取悦的方式求得神灵保佑，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①宗教的原始阶段是以多神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等为特征的，其后才发展为一神的世界宗教，而中国民间神灵信仰的主要来源就是原始宗教、原始信仰。虽然后世的宗教与巫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学者将宗教也纳入广义的巫术，但二者确有不少区别。为此，本书将以对鬼神顶礼膜拜、祭祀祈祷为主要内容的各类信仰活动，包括已转化为民间习俗的宗教现象，归属于“民间俗神信仰”的范围。

禁忌的原意为禁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与之相应的忌讳观念。禁忌也起源于原始时代，出于禁忌观念，人们认为某些特定的事物，或是神圣、圣洁的，或是不洁、不祥、危险的，因此，唯有具备特赋灵力的巫师、祭司方能接触并处理，若普通人触犯了这些事物，必然会招致不幸，甚至祸及氏族。由于禁忌常与原始的巫术和信仰结合在一起，有学者认为，禁忌实际上就是交感巫术的特殊应用方式。^②然而，禁忌作为一种消极防范性的信仰行为和手段，毕竟与“主动”的巫术颇有差别，所以学术界通常是将二者分开论述的。中国传统的民间禁忌，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已广泛流传了数千年。禁忌事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渗透于民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本书也将其作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门类予以叙述。

当然，以上的界定和分类，主要是出于叙述上比较方便的考虑，并未过多地顾及宗教学理论上的逻辑体系。

在此，还需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史料来源有史籍、方志、别

① 有关巫术和宗教的关系，英国学者弗雷泽曾作过比较深入的分析。可参见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75页至9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② 英国学者弗雷泽即持这样的观点，参见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31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集、碑铭、笔记小说等。既然论及民间信仰，文献中尤其是志怪类小说中记载的某人某事的具体情节及其结果，必然杂有诸多虚妄神秘、荒诞不经的成分，但只要此类记载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其所反映的当时人的信仰观念和信仰行为是真实的，本书仍采以为论据。而在行文中，也不拟就其荒谬之处一一予以批驳。

从上海政区的沿革看，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设置紊乱、分合不定的状况。就现今上海市的辖境而言，直至清代嘉庆年间，仍分属不同的政区系统，吴淞江以南的上海、华亭、青浦、娄、金山、奉贤、南汇七县及川沙抚民厅属松江府，吴淞江以北的嘉定、宝山二县及长江口的崇明县则属直隶太仓州。本书所论之空间范围即以现今上海市的辖境为界，包括上海市区以及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嘉定区、宝山区、金山区、奉贤区、南汇区、浦东新区和崇明县。其中，论及上海开埠以来民间信仰习俗的演进、变异时，考察的侧重点尤多集中在上海市区及其近郊。

本书所论之时间范围，上自新石器时代的马家浜文化，下及民国时期。然而，上海地区有独立行政建置的时间较晚，截至元代，指称明确的区域性史料仍非常缺乏，故本书的第一章只能以溯源的方式，按照时间序列，自远古迄元代，将上海民间信仰习俗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勾画出大致的线索与轮廓。其后几章，则分门别类地对明清以来的状况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作为社会文化和民间习俗组成部分的民间信仰，自然是在特定的区域性文化的制约下生成、发展和演变的。从区域史的角度考察上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可以发现，上海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杂糅多变。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显示，远古时代，生活在上海地区的土著居民即与其他地区有过文化上的交流和人员上的往来。春秋时期，上海先后隶属于吴国和越国；战国时期，又被归入楚国的版图，深受楚文化的

影响。秦汉以来，中原文化的影响不断渗入，更使上海地区的文化面貌凸现出多种因素杂糅并存的特征。自东汉设置吴郡后，上海地区曾长期位于吴郡的辖境之中，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往往将上海视为吴地的一部分。宋、元、明、清，上海的政区虽屡有分合^①，但以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为中心的苏南、浙西一带已逐渐形成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皆颇具共通性的“江南”地区。^②由于长期与邻近的江浙地区同处于一种类型的区域性文化之中，即人们常说的吴越文化、吴地文化、江南文化，上海地区直至清代中期，其文化氛围和民间习俗与苏州、常州、嘉兴、湖州等地仅存在大同中的小异，并无根本的差别。文献记载中称：“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③，即反映了这一地区在文化和民俗上的同一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大同中的小异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细加分析，其间的差异还是清晰可辨的。以松江和苏州为例，历史上两地的联系最为密切，尤其是宋元以降，苏州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其对松江的影响也最为巨大。人们习以“苏松”连称，说明两地不仅地域毗邻，风土人情也大致相同。然而，明代万历年间的松江士人范濂在记述同郡擅长书画的文士莫是龙时，却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公性豪举，不拘小节，尝嗜弈，终夜较不倦。有相知好雅洁者，邀坐斗室中，焚香煮茗，兼供佳膳，辄亶亶亡归。与先辈文徵仲、唐伯虎臭味相埒，绝无

① 宋代，上海地区分属秀州和苏州；元代，华亭县升为松江府后，淞北地区隶属于平江路；明清时期，上海的淞北地区又先后隶属于苏州府和太仓直隶州。

② “江南”的地区概念在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演变，并有泛指和特指之分。明代郑晓：《今言》卷3提及“江南”时特指常州、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五府。当代学者在界定“江南”的地区范围时，多倾向于特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相关问题可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越绝书》卷6《越绝外传记策考第七》、卷7《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

松人俗态。以拔贡为国子生，名重都下。”^①在论及松江府境内的园林宅第时，范濂更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自己不喜欢上海的原因：“予厌其风俗粗鄙，故常倦游。”^②范濂以身为松江人的切身感受，在标举莫是龙与苏州名士文徵明、唐寅“臭味相埒”，以及贬斥上海“风俗粗鄙”之时，实际上已明白地揭示出，苏州与松江之间存在着“高雅”与“凡俗”、“精致”与“粗鄙”的差异。时至上海开埠之初，客居上海的江苏甫里（今名用直）人王韬也以外乡人的眼光，看出了苏州与上海的不同。他在肯定上海地区“其俗喜夸诈，尚奢靡，与吴郡略同”时，又指出其“濒海之民，龌鄙近利，尤好争斗，久染闽、粤之风”的特点，并进而论道：“盖滨海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宜为其所讥也。”^③如果剔除文人的传统偏见，综合上述记载，不难看出，与深受中原文化浸染、“温文尔雅”的苏州相较，上海更多一些地保留着沿海地区特有的粗犷、剽悍、刚劲、率直的民风民俗，所背负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更轻一些。正因为如此，上海地区在文化上的排斥性较小一些，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大一些，更易于吸收各方文化的精华，形成杂糅并存的文化氛围。由此可见，即便在古代，上海地区的社会文化和民间习俗，仍有其一定的独特个性。

上海开埠以后，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海派文化”。对于“海派文化”，当代学者多有论及，且不论这一冠名能否成为共识，但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百余年来，创新、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确实已成为上海地区社会文化的典型特征。^④

①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1《纪人物》。

② 同上书，卷5《纪土木》。

③ 王韬：《瀛壖杂志》卷1。

④ 有关“海派文化”及其特点的讨论，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可参见该卷第62至69页。

上海文化的诸多特点，在民间信仰习俗上也皆有其或隐或显的体现。

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不仅具有“上海”的印记，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是十分深刻的。原始先民在祭坛旁的燎火作法，渴望的是人丁兴旺、时可温饱。村民农夫在猛将庙前的赛会献媚，祈求的是无灾无祸、五谷丰登。天妃宫内的香火缭绕，反映了云集沪上的行商走贩对风平浪静、货运通畅的祝愿。五通五路的骤然而兴，凸现出商品经济下的金钱魅力和发财梦想。……有鉴于此，本书的旨趣不仅希望通过比较全面的叙述为上海史的研究拾遗补阙，使之变得更加丰满厚实，也希望通过比较深入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上海地区社会文化的整体演进。惟祈冥冥之志，克副斯任！

第一章

上海民间信仰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主要来源于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和原始的禁忌习俗，因此，讨论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习俗也应从其源头说起。然而，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类的各种原始信仰究竟是如何萌生和发展的，后人已无从获得直接而明确的证据，于是，学者们只能凭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此作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测与说明。就上海地区的民间信仰而言，不仅探究其渊源同样会面临上述的问题，而且追寻其流变，也往往因元明以前相关史料的极端匮乏而陷入文献不足征的窘迫。有鉴于此，我们也只能从理论上对民间信仰的起源和发展作一些探索，并依据有限的资料，尽可能对明代之前上海地区民间信仰的传承和演变梳理出一条大致的线索。

第一节 原始信仰的起源与流变

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中国民间信仰的主要源头也是原始巫术、原始宗教和原始禁忌，为此，有必要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此略作诠释，并就其在中国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轨迹作一番探究。当然，相关研究的进展已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试图用单一的事实来解说原始信仰这一极其复杂的现象是非常困难的，要给出一个令人稍感满意的说明，必须借助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社

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一、原始巫术

作为前宗教现象之一，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体现了人类对于运动和变化着的大自然（包括人类自身）所作的最初思考和反应，所以说，巫术观念的起源几乎与人类思维的起源一样久远。早在任何宗教观念产生之前，原始先民已通过本能的直观感受而觉得自然界中的许多物体都与自己一样是“活的”，即所谓的“物活感”。他们认为，这些物体之所以是“活的”，是因为其与客观物质世界之外的某种超自然力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信，人类能够借助这些超自然力量，并强迫它以某种特定的、预期的方式行动，以达到影响、控制人类和外在世界的目的。学术界将这种原始信仰以及相关的行为，称为“巫术”。

试图通过现存原始文化的研究去揭示人类早期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家，最早注意到原始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巫术”现象。英国学者弗雷泽在其名著《金枝》一书中，对巫术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①他对巫术作了如下定义：“巫术是一种被歪曲了的自然规律的体系，也是一套谬误的指导行动的准则；它是一种伪科学，也是一种没有成效的技艺。巫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体系，即关于决定世上各种事件发生顺序的规律的一种陈述，可称之为‘理论巫术’；而巫术作为人们为达到其目的所必须遵守的戒律，则可称之为‘应用巫术’。”^②弗雷泽所说的“理论巫术”就是“巫术观念”，“应用巫术”则是人们为

① 弗雷泽所著《金枝》共有四个版本，分别出版于1890年、1900年、1911年至1915年、1922年，其中第三版有12卷，篇幅最大。目前通行的中译本由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据第四版译出。在巫术研究的领域中，《金枝》实堪称开创性的学术巨著。

②（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19至20页。

实现某种愿望而实施的一系列“法术”。

对于巫术的原理，弗雷泽也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会发现它们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前者可称之为‘相似律’，后者可称作‘接触律’或‘触染律’。巫师根据第一原则即‘相似律’引申出，他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从第二个原则出发，他断定，他能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基于相似律的法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基于接触律或触染律的法术叫做‘接触巫术’。”基于上述原理，弗雷泽遂将原始巫术分为“顺势巫术”（即“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两大类，并将二者都归于“交感巫术”这一总的名称之下，“因为两者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地互相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①

其后，学术界在巫术问题的研究上有新的推进，对弗雷泽的一些观点有所修正。如功能学派的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巫术的举动是在某种条件下，产生特殊的力量，……而让无出路的情感得到戏剧性的发泄。”因而既非“伪科学”，亦非完全“没有成效”。^②文化心理学派的学者同意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认为巫术之所以受民间的欢迎，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心理上的排解功能。不过，弗雷泽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仍是巨大的，他对巫术原理的分析以及对巫术行为的分

①（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第19、21页。

②（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等译：《文化论》，第65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